

# 怀袖雅物

*Six Hundred Years of Folding Fans of Suzhou (I)*

## 苏州折扇六百年

(上)

□赵羽

Zhao Yu



The paper tells the history of six hundred years of folding fans of Suzhou, and introduces some affiliated arts, such as the fan's sector, bone, pendant and boxes.

中国最早的扇子，传说始于虞舜。晋崔豹《古今注·舆服》说：“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皇帝）不得用也。”由此看来，最早的扇子主要并非风，而是帝王们为了广开视听，招贤辅政，将治国的主张写在扇子上，用来昭示清明。以后由此转化为“障扇”，可以蔽风尘、遮骄阳，并成为古代帝王出行的一种仪表。可以想见，这种由侍者所持的大扇与一般手摇的扇子是并行不悖的。扇子的最大功能还是消暑纳凉，以邀清风。

我国的扇子种类很多，几乎利用了所有的可用之物来制作扇子。竹编扇、羽毛扇自不必说，诸如蒲草、麦秆之类，都可以做成不同风貌的扇子。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扇子实物，是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竹编扇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竹编扇。两把扇子的摇柄都偏在一边，其形状就像一扇缩小的门，那摇柄便是门轴的延长。

折扇是折迭扇的简称，它以竹木或

象牙等为骨，韧纸或绫绢为面，可收拢折迭，因此又被称为蝙蝠扇、撒扇、聚骨扇、聚头扇等。

在我国，“折扇”出现的时间较晚，文献中说是古代日本和高丽人所发明，宋代传入我国，普遍使用则是在明代永乐年间（1403至1424年），亦称“聚头扇”、“折迭扇”。但其实不然，根据本次的整理研究发现折扇据古书记载可能魏晋就出现过，宋代受日本、高丽的影响，中国又开始制作折扇。这属于一种技艺“回流”现象。

北宋年间，折扇由日本作为时髦的舶来品，开始在上层社会流传，《宋史·日本国传》记端拱元年（988年），日本使者的礼单上就有“金银画扇筥一盒，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蝙蝠扇就是折扇。北宋折扇的罕见和珍贵，还可从宋人话本里得到佐证。《赵旭遇仁宗传》（即《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说仁宗微服出宫，上樊楼饮酒，“仁宗手执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倚着栏杆看街，将扇柄敲榭，不觉失手，坠扇楼下”。“月样白梨玉柄扇”当为折扇无疑，可见折扇在当时供宫廷御用，

并非为民间所常见，话本中将它作为身份的标志。

宋人仿制日本、高丽折扇已在南渡以后，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四中记道：“宋人用折迭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以象牙为骨，饰以金银，盖出于高丽。《鸡林志》云：‘高丽迭纸为扇，铜兽鬚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中国转加华侈云。’”可见在南宋，仿制折扇“转加华侈”，在技术上、装饰上都有很大进步，已呈青出于蓝之势。今存最早的折扇图像，仍是1978年在江苏武进南宋墓葬出土的戗金花卉人物朱漆奁，奁盖上戗画着《仕女消暑图》，两个仕女一持团扇，一摇折扇，表明南宋后期折扇已在大户人家普遍使用。

由此而至明永乐年间，折扇日趋于普及，一说得力于成祖朱棣的推广，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记道：“其扇本名折扇，亦谓之撒扇，取收则折迭，展则撒舒之义。明永乐中，朝鲜国入贡，成祖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由宫廷而民间，折扇逐渐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用





清人避暑山庄图励宗万书诗成扇·扇盒

品。

至明代中期，苏州成为折扇的重要产地之一。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有曰：“上自宫禁，下至士庶，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直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扇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又曰：“蜀扇譬之内酒，非富人笥中则妇人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面为贵，近乃并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柄值白金半两，斯亦淫巧无用者矣。”苏州之所以成为折扇的重要产地，并以精雅、时尚独步天下，有其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因素。

洪武初，朱元璋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豪族地主进行限制和打击，且在江南征收全国最重的赋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宣德、正统年间，苏州知府况钟在江南巡抚周忱支持下，在民生经济上即采取“减浮粮”、“定济农仓”、“立义役仓”三大措施，并招抚流民回乡，兴修太湖水利，恢复发展生产，极度衰蔽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苏州经济建设进入良性循环，出现了繁荣富庶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手工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结构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行业，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苏州遂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面对这样的变化，官商士民无不欢欣鼓舞，社会思潮也开始渐渐转向，客观上突破了传统礼制对于

衣食住行的森严规范，价值观念发生异化，特别是工艺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明代苏州诸多才华横溢、成就卓绝的人物聚集苏州，不但腹心相照、声气相求，而且各擅所长，风采迥异，“家家抱荆山之玉，个个掌灵蛇之珠”，呈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工艺史上自然也不例外，值得一说的是，明代苏州文化人对工艺思想的推进、工艺技术的提升、民间工匠与士大夫的交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形成以精雅为主要特点的苏式工艺风格，在美学上作了全面观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苏州折扇成为风靡一时的“怀袖雅物”。从出土文物考察，明代苏州的折扇使用已相当普遍，其中书画扇盛行，有的还作为生前的钟爱之物随葬墓中。1966年，在市郊



清代 琥珀鱼纹扇坠



清代 核果扇坠



清代 紫晶扇形坠



清代 琥珀金蝉扇坠



清代 核桃生肖扇坠



清代 玛瑙荷叶童子扇坠

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发掘王锡爵墓，出土折扇三柄，其中男用十六方九寸圆头水磨竹骨纸面书画折扇一柄（扇面已毁）；女用二十二方寸圆头雨金乌漆竹骨洒金扇两柄，扇面黑底洒金加贴金大小菱形图案，保存完好。1973年，在吴县洞庭公社红光三大队发掘许志问墓，出土折扇三柄，一是乌木骨十二股泥金面，文征明书画两面；二是竹骨十二股泥金面，申时行书一面；三是随葬明器。上述文物乃是明代苏州折扇的实例，充分印证了苏州折扇艺术的辉煌成就。

清代是折扇发展的鼎盛时期，材质多样，制作各别，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称折扇自永乐以后，“至本朝三百余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

者、沉香者、棕竹者、各种木者、罗甸者、雕漆者、漆上洒金退光洋漆者，有镂空边骨内藏极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镂空通身填以异香者。扇头钉铰眼线，有镶嵌象牙、金银、玳瑁、玛瑙、蜜蜡、各种异香者，且有空圆钉铰，内藏极小骰子者，刻各种花样，备极奇巧，甚有仿拟燕尾，更有藏钉铰于内而外无痕迹者。其便面有白纸三矾者，有五色缤纷者，有糊香涂面者，有槌金者、洒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轻细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涂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纱为面，可以隔扇窥人者，曰瞧郎扇；且有左右可开，制为三面，暗藏其中画横陈者，曰三面扇。”

清代苏州仍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大城，在苏州民间工艺品中，折扇仍是

大宗，行销南北。清初，苏州精制的水磨竹骨折扇仍进贡朝廷。雅尚苏州折扇的风气，也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如《红楼梦》第六十七回，说薛蟠从苏州带回的物品中就有扇子，与自行人、酒令儿、沙子灯、泥人儿、捏相等，都是最具苏州地方特色的“土宜”。徐扬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所作《盛世滋生图》长卷中，也画有两家扇庄，一家在木渎中市，悬有“苏杭杂货”、“各色雅扇”招牌两方，柜上就挂有折扇；一家在山塘桥堍，檐外悬有“手巾扇子”招牌一方。这是苏州折扇市场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它仍是“怀袖雅扇”，另一方面它深入民间，引车卖浆之流也用它来招风纳凉。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演说评话者，将折扇作为道具，既如实用，又虚拟使用，收拢时作为朴刀、



明代 白玉红沁羊扇坠



明代 葫芦犀牛角扇坠



清代 春宫瓷扇坠



明代 白玉人物扇坠



清代 淡雪青平金钉线绣玉堂富贵扇袋  
(故宫博物院藏)

长枪、棍棒，展开时作为托盘、木枷等，这是折扇对表演艺术的特殊贡献。

清代苏州折扇业，既有扇庄，又有作坊。扇庄有的是前店后坊，制作兼经营；有的仅收购作坊制作的扇骨、扇面，装配后销售。乾隆时阊门内西街的毛恒凤扇庄，道光时的丁方九扇庄、益美斋扇庄，光绪时阊门上塘的古训堂扇庄，都负有盛名。同治初，扇骨作坊有十余家，从业者百余人，苏州折扇业为保护行业利益而成立公所，设址于桃花坞韩衙庄。光绪年间，随着沪宁、津浦、京奉铁路通车，苏扇销往北方特别是奉天的数量剧增，苏州折扇业开始委托南京、常州的制扇作坊加工，继而两地陆续有作坊迁来苏州。

民国初年，苏州折扇业持续发展，作坊集中地由韩衙庄扩展到阊门内西

街。公所改组，一分为三，扇骨公所在韩衙庄，扇面公所在后新街，雕边公所在隆兴桥。各公所又分大行、小行，作坊入大行，个体制作者入小行。当时扇庄以张多记扇庄为最大，业主张多宝于清末从常州迁居苏州，开设作坊，制作高档折扇，民国初年发展为扇庄，所制竹折扇，1921年获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一等奖，同年又获江苏省第二次地方物品展览会三等奖，又参加1929年的首届西湖博览会，它以嘉禾为商标，声誉日隆，销量日增，成为苏州第一大扇庄。同时，苏州还有李瑞记、唐恒和、黄荣记等扇庄，各扇庄在北京、天津、沈阳、昆明等设有分销点。

1949年后，苏州扇庄有许新记、唐恒和、张卿记、黄荣记、李瑞记、祝金记、唐嵩记、杨政记、时瑞记、杨源记

十家。1954年，苏州制扇业手工业劳动者分别成立了三个生产联合小组，1955年合并成立了折扇生产合作社，1957年集中生产，1958年建苏州扇厂。

这一时期，除生产传统折扇外，开发了女折扇、民航扇、导游扇、广告扇、舞蹈扇、轻便扇等新品种。1981年批量生产长60厘米至100厘米的大折扇，作为室内装饰品。1982年又试制长200厘米的特大折扇，宛如屏风，在广交会上展出。1981年，苏州扇厂的水磨竹骨折扇获得江苏省工艺美术百花奖，同年在全国扇子评比中被评为第一名。这一时期的著名制扇艺人，有杨春来、王健、杨长云、徐义林、曹小弟、徐家栋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发生变化，扇厂转为民营，同时出现多个独立经营的折扇作坊，这标志着民间工艺品



清代 刺绣孔雀开屏纹扇袋

清代 刺绣一品清廉纹扇袋

的制作又回归民间。

自明代以来近六个世纪，苏州折扇兴盛不衰，历久弥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财富。明清时期苏州折扇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与苏州当时发达的经济文化，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原料资源，以及优越的传统手工技艺都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后可以为良”。2006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近出版的《怀袖雅物》（赵羽主编）便是一部详细记载苏扇的历史文献，全面展现明清以来折扇在材质、造型、雕刻技艺、扇画艺术的全貌，反映苏扇600年来的发展历程。

近三十年来，随着全国收藏热潮的涌动，折扇收藏成为热点，无论成扇、

扇骨、扇面，乃至扇坠、扇袋、扇盒等，都受到收藏者的青睐。这不但体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化需求，更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文化遗产的珍视和钟情，因此它的生命力是经久不衰的。

对于一把折扇，主要由扇骨和扇面两部分组成，因此评判其价值就要考虑两个方面。扇骨考究的制作工艺，体现出工匠的高超技艺；扇骨上精道的雕刻艺术，体现了精细雅致的艺术风格绘制、雕刻者巧夺天工的技艺；扇面上气韵丰沛的书画，提升了扇子整体的艺术魅力。

在把没有打开的折扇放在人们面前，首先看到的是扇骨的材质和外观造型。材质美，造型巧，自然就会博得人们的喜爱。

如说材质，扇骨则以竹、木为多。

即使有紫檀、乌木等较好的材质，甚或象牙、玳瑁之类，但内行还是普遍喜欢竹折扇。明代沈德符《野获编》记载说：“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在扇面与扇骨之间，大众看好的是扇骨，而扇骨中惟以竹为雅。这就是著名的水磨竹折扇骨，竹色蜡黄而玉润，丝纹纤细而挺秀，清新秀美，本于天然。看似普通的竹材，但其柔韧性和坚硬度却胜过能入扇骨的其他材料。明代有制扇名手沈少楼、柳玉台所制扇价至一金，而有蒋苏台制一柄竟价值三、四金，尚且争购不得。折扇本是文人学士的“怀袖雅物”，讲究的是“风雅”两字，所以虽以紫檀木制作的竟被视为“俗气”。这就是淡雅和



清代 黄缎盘金银绣五毒葫芦活计扇袋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 盘金绣葫芦纹扇袋

清代 粤绣孔雀开屏纹扇袋

艳丽之分，这就是素雅与繁华之别。这就是折扇的艺术，这就是艺术的选择。

若论造型，折扇除了材美，便是工巧了。制扇技艺从扇骨外观造型上就能看出分晓。扇骨的长、短、多、寡、宽、窄及式样组成了扇子的形状，所以扇骨的造型变化甚多，根据不同组合，可获取不同的艺术效果。在扇骨聚头处，即折扇手执的柄部（把手），虽然是末端，造型变化却是多达百余种。如明代的古方头、排茄头、花鼓圆头、玉兰方头，清代的大圆头、大瓶式头、葫芦头、琵琶圆头等，各有风貌特色。可以说，扇骨虽长不盈尺，宽仅寸内，但经制扇艺人的妙思巧构和精湛技艺，竟能造就千变万化的艺术构图，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

而且技术人员还能对扇骨施行多种

艺术装饰，如刻面、嵌贴、漆面等。刻面，是书画家与技艺人员合作施展才能最佳的地方。在如此狭窄的扇骨部位，要达到书画才艺的展示，本来就是一个难题，既小而又要雅，难上加难；技艺人员则要根据书画内容，采用雕刻技艺，或透雕、浅雕、阴刻，或阳文留青竹刻，处处要见刀功才思。嵌贴，则在有限的扇骨上再镶嵌螺钿、骨石，构造立体画面。漆面是要采用雕漆工艺，多次施漆、打磨，直到光色灿烂，再行雕漆。

经过艺术装饰的扇骨，特别是刻边，附加了文化内涵，提升了它的艺术价值，如是名家所作，物以人重，成为传世珍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记了一件事：“正德中吴人刘永晖所制阔板竹骨扇一柄贻余，曰：‘扇

工虽琐细，然求如此浑坚精致者，其法绝矣。’扇有陈眉公书一绝云：‘万壑松涛碧影流，石床冰簟冷如秋。卷帘飞瀑悬千丈，恰对吾家竹里楼。’诗意既清迈，书法亦苏、黄、米相杂。”李日华所得的这柄“浑坚精致”的阔板竹骨扇，乃正德间苏州高手刘永晖所制，扇面则为万历年名士陈继儒所书自作诗，珠联璧合，自然十分难得。另外，折扇的附属品扇坠、扇袋、扇盒，乃是它的外部装饰。扇坠系于扇柄之下，材质多样。《长物志》卷七曰：“扇坠宜用伽南、沉香为之，或汉玉小及琥珀眼掠皆可，香串、缅甸之属，断不可用。”这就是名人相互馈赠的名家所制竹骨扇，浑坚精致，做法奇绝，由此可见，扇骨早已从实用性而进入可赏玩的艺术境界。



扇骨竹刻，又名箠边竹刻，“箠”即是扇，高诱注《淮南子·精神训》曰：“箠，扇也，楚人谓扇为箠。”“边”即是大边，也就是折扇的大骨，扇骨竹刻是将竹刻技艺运用于折扇大骨上的一门雕刻艺术。竹刻本来仅是雕饰工艺，直至明代中晚期，也就是与折扇兴起同时期或稍晚，由于大批文人巧匠的参与而大放异彩，竹刻也从单纯的雕饰工艺一跃而上升为供人把玩品赏的一门独特的雕刻艺术。开此风之先并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明代嘉定三朱（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和金陵濮生（濮仲谦），清早期的张、沈、吴、封（张希黄、沈大生、吴之、封锡禄）以及乾隆时的周颢、潘老桐等。当时形成了著名的嘉定、金陵两派，而金陵派由于本身就处于折扇兴起的皇城（南京），其

浅阴刻的竹刻技法主要运用于扇骨雕刻上，因此可以说金陵派首先开创了扇骨竹刻，这从前人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扇骨竹刻流传至今的明代实物已罕见，仅见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柄刻有“仲谦”款的浅刻扇骨，两扇均出自河北省的一座明墓，扇骨上分别用阴刻法刻梅花、水仙、兰花及诗句。据记载，濮仲谦生于明万历年间，他的竹刻当时就名噪一时，虽然最为人推崇的是他的不事刀斧，经手略刮磨即成器之竹刻，但他另一个特长便是刻扇骨。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竹刻家李文甫也擅刻扇骨，且同他风格相近，因此李、濮二人被后人称为“金陵派”开山之祖。可是，李、濮二人在明刘銮《五石瓠》、文震亨《长物志》中都讲是苏州人，是苏州人流寓金陵，还是金陵人曾寄

踪吴中，很难定论，然而，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他俩均生于明中晚期，均擅刻扇骨竹刻，并以此闻名于世，因而我们可以推想扇骨竹刻在明中晚期已非常成熟。由于扇骨竹刻不易保存，明末清初之实物已是难觅芳踪，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多的是清嘉道以来的东西。以前许多竹刻史论家常感叹晚清以来竹道衰微，不复有明末清初那般技高韵古。诚然，在文房雅玩和案头清供领域，后者难望前人之项背，但走前人未走之路，另辟蹊径，在扇骨竹刻上大显身手，正是嘉道以来竹人正确的选择。扇骨既薄且窄，用武之地极其有限。然这方寸之地经二百余年无数竹人的不懈努力探索，却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其间另一个关键要素，即自明代中晚期开始，城市繁盛，尤其是江南一些城市随



清 象牙镇珊瑚拱轮排圆头扇骨



市玉竹一根葱禹门洞九五·十一  
方琴式圆头扇



乌木小钩开花头扇骨



髹漆冰裂纹瓶式头扇骨

着手工业、商业的兴起，经济富庶，文风蔚然，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壮大，他们需要和喜爱像折扇这样精致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手工艺术品，特别是嘉道以来玩扇赏扇之风日盛，官绅士人互赠书扇之风盛行，文人出门应事，朋友聚会，手执一扇，舒卷谈笑，尽显自身儒雅。如果折扇上有名人书画，名家雕刻那更是脸面生光，折扇成了一件标榜自己身份地位的展示品。在经济这一活水的滋养下，于是造就成全了大批刻扇名家的萌生。由于玩扇赏扇者当时主要集中于文化经济发达的地方，因此，晚清民国期间，刻扇竹刻家最活跃的地方是江浙二地和京津地区，苏州作为文化名城，又是巧匠辈出之地，明中叶又以吴门画派引领域内，扇骨竹刻自然独领风骚。



红木扇箱